

“旅大派”汉奸中的四员干将^①

张福麟

在伪满汉奸集团中，有一伙人后来居上，十分得宠，那就是被称为二等皇民的“旅大派”。

1905年日俄战后，日本终于从沙俄手中夺去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将大连、旅顺、金州、普兰店以南地区统改为关东州，设立关东都督府，驻扎关东军，并控制了大连至长春的南满铁路，当了名符其实的南满霸主，将旅大地区变为不折不扣的殖民地。畸形的环境造就了一批畸形人，他们就是被称为二等皇民的一部分“关东州”人。这部分人在“九·一八”事变后，纷纷参加傀儡政权，在伪满汉奸集团中，成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旅大派”。

一、他们被称为“二等皇民”

旅大派的主要头面人物有谷次亨、卢元善、阎传绂、王贤伟。他们作为日本人一手培养的二等皇民，有某些共同特点：

第一，他们自小受殖民地奴化教养培养与熏染，日语都特别好，素有“二鬼子”之称。他们从小皆就读于关东厅殖民当局所办的学校，然后去日本留学，只有王贤伟没去日本念书，其余三个人，谷次亨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卢元善毕业于日本仙台宫城县立农业学校，阎传绂则为日本名牌大学东京

^① 题目为编者所加。

帝国大学德法经济科毕业生。日本人很欣赏阎传绂日语说得流利，认为他的日语纯熟得几乎到了家，地道得甚至有仙台的土音，能在宴会上自如地唱日本的民谣、俗谣及各种民间小调小曲。

第二，他们都拥有比较丰厚的家财，有的人是名门大族出身，在旅大金州地区颇有社会影响。王贤伟是张作霖时代的著名文治派领袖人物、奉天省长王永江的儿子。阎传绂的伯父阎福升是清朝时金州副都统、二品大员，还在阎传绂念书时就花钱为他捐了个六品顶戴。他家是金州城的首富，世称“阎半城”，谓其有半城之富，日本人也知其财力大，甚至称他为“金州的阎，阎的金州”。卢元善曾当过近20年的金州教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当地无人不知。

第三，他们早就与日本勾结，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劳。谷次亨和阎传绂均是满铁职员。阎传绂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张作霖政权希望他能回沈阳做事，当时提出几个地方供他选择：或就任东北大学学长，或作图们江铁路总办，或任奉天纺纱厂长，他都加以拒绝，而主动投入“关东州”日本殖民统治圈里，特别又进了日本侵略东北的经济掠夺大本营——“满铁”，充任调查课职员、农务课嘱托，成了满铁会社第一个中国人社员。他曾用日文写成《奉天土地制度与财政制度》一书，对辽宁省的税收和土地的种类与沿革，做了系统介绍，为日本的经济侵略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特别对以后日本在中国东北收买土地，进行移民开拓有极大的帮助，因而深得“关东州”日本殖民当局的信任，各种头衔都纷纷落到阎传绂头上，他开始成了旅大知名人物：什么大连中华青年会副会长、“关东厅”嘱托、中日文化协会委员、评议员、南金书院监事、育英会干事、中日俱乐部常任理事等等，以后更进入大连市议会做议员，直接

参划市政，成了十分活跃的政治头面人物。据阎传绂自己说，在“满铁”任嘱托前后，他还帮助“关东州厅”当局联络一些来大连的旧军阀政客，如张宗昌、王承斌、王揖唐、王克敏、张弧等，他极力拉拢这些人投靠日本，做日本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侵略工具。谷次亨先在“满铁”本社（大连）做地方部职员，又在长春附属地“满铁”地方事务所做课员。以后离开“满铁”转为张作霖统治下的东三省盐运使公署做东文秘书兼外私课课长，不久，又调任奉天盐务缉私局局长的职位。由于谷次亨是“满铁”出身，在办理盐务过程中，和“满铁”的地方部长田边敏行、地方课长井下美多雄、铁道部次长宇佐美莞尔、总务部庶务课长石本贯太郎等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往还，尽力为“满铁”提供方便，日本人对他的“衷心效力”十分满意。卢元善因其社会关系广泛，又有为人师长的地位，颇能迷惑一些人，因此日本人就积极利用卢元善有人望的这一点。据说，凡是日本人感到棘手的，在群众中办不通的事情，去找他都能帮助解决；反过来，中国人有难办的事情，和日本人不好交涉的事情，去找卢元善也往往能办成——日本人也要给他一点面子——所以逢年节卢家可是门庭若市，全城几乎有一半的礼物送到他家。王贤伟因为年轻，在“九·一八”事变前，和日本人直接交往不多，但他也是沾了其父王永江与日本有过旧情的光。据说1926年郭松龄起兵倒戈从关内杀回东北，势如破竹，张作霖处境十分危急，是王永江出面与关东军谈判订有密约，以“五路合办”为条件，要求日本出兵，阻碍郭军过南满铁路，使之不能攻取沈阳城。日本果然予以干预，使郭松龄滞留在新民、巨流河一带，不得前进，给张作霖以调兵遣将的喘息机会，终于反败为胜。王永江作为东三省政界要人与日本关东军有很深的老关系，虽然他已于1926年故去，但关东军不会忘掉他们这位老朋友，王贤

伟借重其父的影响，倍受日本人重视。

第四，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主动投靠日本，深受关东军的信任，在伪满汉奸集团中，虽然资历浅、官阶低，提升却很快，并位据重要岗位，有后来居上之势。由于他们处于关东州这一殖民地的特殊地位，早与日本有关人士发生联系，事变之后能通过各种途径很快充当了政治傀儡的角色。阎传绂因为在旅大早就参与政事，与大连民政署长辛岛知己和金州民政署长增田道义相结识，“九·一八”事变后，当日本帝国主义急于物色汉奸做帮手时，辛岛和增田就积极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推荐阎传绂，遂使他先充任伪奉天省咨议，考察了一段时间，不到一个月即接替赵欣伯出任伪奉天市长兼商埠局总办。一上任，阎传绂就大显身手，积极筹划“大奉天都市计划”，以后又升任伪滨江省长、伪吉林省长，帮助日伪当局压榨农民，掠夺粮食。若说阎传绂在旅大派中算有点身份的话，其余三个人于仕途而论，则就没有什么资历可说了（特别是王贤沛），但他们却先后充当了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的重要角色。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推行二重政治，即在表面上，无论中央还是地方行政机构的正职均为中国人，副职为日本人，但实权却全由副职的日籍官吏掌握。在诸机构中，推动中央行政机构运转的中心部门是伪国务院总务厅，其地位十分重要。关东军参谋部《关于人事事项》中明确规定：“在军部掌握下，推行总务厅中心主义”。总务厅是“满洲国”实际上的国务院，它和关东军第四课（负责对伪满进行内部指导），构成了当时的政治统治中枢。在总务厅长官的主持下，召开定期的次长会议（即所谓“火曜会”），伪满一切重大决策都将在这个会议上做出，然后拿到国务院会议上走走过场。原来出席“火曜会”的全是日本人，后来关东军为了装点门面，缓和中国官员的不满，也为了进一步分化收买

汉奸，从1937年7月谷次亨任伪总务厅次长始，“火曜会”便有一名中国人参加了。当然，也只是个“配搭”。不过，能当上“配搭”也不那么简单，不是被关东军十分信任的“宠儿”，是决没有资格得到这份“殊荣”的，这是很让汉奸们羡慕的位置。谷次亨是第一个“荣升”到这个岗位的中国人，其后，卢元善、王贤伟也先后充任了这一重要的傀儡角色，直至“八·一五”伪满洲国覆灭。这三个“宠儿”，谷次亨还算有些当官的经历：“九·一八”事变当时，他的官位乃本溪湖煤铁公司首席秘书，以交出煤铁公司全部资产和人员做见面礼，经奉天宪兵队长二宫的介绍，投降了关东军。以后凭着自己善于钻营的本事，经常出入关东军司令部，在伪国务院内有星野直树作后台，开始“春风得意”。星野是从日本国大藏省来的，是搞经济掠夺的行家能手，他一手炮制了所谓开发满洲计划，资金不足，由谷次亨跑到沈阳找志城银行经理陈楚材等为其筹款，因而更讨得了星野的欢心，自然官运亨通。至于卢元善、王贤伟二人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为官的履历。前者在金州一直当教员，是通过韩云阶的关系才得以入伪满政界，充当伪黑龙江省公署秘书，实际上担当的是日语翻译的职务，日本人看中他深谙奴化教育之道，他也很会做戏，平时总标榜自己如何敢与日本人“争”，在有些场合也真真假假地演了几出“仗义直言”的戏，颇迷惑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因此关东军更想利用他，官级一升再升。王贤伟在“二等皇民”中年龄最轻，他之所以踏入伪满政治舞台，一半仰其老父的余荫——王永江和日本人的老关系，一半也是他在中东铁路局任电务处副处长时，秉承督办李绍庚和公署事务官佐藤通男的指令，将电务处负责传递的苏联来往电报，按时偷送出来做为情报报给公署，这种特务活动显露了王贤伟对日本的“忠心”，很受关东军的赞赏，使他这个东北大学工科机械

系毕业生，竟先后当起伪警察厅长、伪市长，最后爬上了最让汉奸们眼红的伪总务厅次长的地位，其升官速度之快，让人们惊讶得咋舌。

二、他们四人各有独特的媚日卖国表演

这几个“旅大派”的头面人物，也真没辜负关东军对他们的信任和提拔，在长达十几年的政治傀儡戏中，确实有过不少出色的表演，在汉奸活动的邪恶路途上，留下了一串很深的印迹。

谷次亨以创制《十年鸦片断禁计划》而臭名远扬。本来，伪安东省教育界发生救国会大镇压事件后，他出任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帮助日本人收拾善后，就很惹人议论。原先的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一直有反日复国思想。“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正任安东县长，曾拿出一部分县里经费支援过张学良的东北军，日本警宪有关人员掌握了这一情况后，一直伺机对他下手。最后，借口他管辖下的伪安东省立通化师范学校校长参加天津的抗日救国会（以教员为中心），大肆杀戮，而且从教育界扩大到商务会，从安东市波及到11个县，孙文敷等共58人被枪毙，300余人被判刑，幸存者也人心惶惶，全省9000余教职员，有半数辞职迁走，而且造成商业萧条，经济萎缩。这一切，据说全是伪民政部警务司长长尾吉五郎一手搞的。此时，谷次亨正在伪警务司当保安科长，与长尾相交契合，同关东军第四课的辻大尉也往来频繁，算是警宪圈子里的人物。因此，长尾特别推荐他去处理安东教育界救国会事件的善后事宜，得到关东军的支持。

安东地区处于辽南三角地带，邓铁梅、李春润、苗可秀等抗日武装在此十分活跃，因此关东军对安东地区的治安特别重

视。谷次亨去了不久，司令官植田谦吉特去视察，并向谷次亨询问了治理安东的对策，谷次亨向植田建议，对知识分子要采取安抚政策，对没牵涉者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动员大家复职，不要扩大事件影响；确有反满抗日行为者按司法手续办，这样可以稳定大局。他还提出不要随便征收商界的钱财；更献计说，在各级中学里可派遣日本人充任校长和骨干教员，既体现日满合办教育，又能控制学校教职员与学生的思想。这番建议博得植田欣赏。当即授权谷次亨放手去干。有了“尚方宝剑”，谷次亨大展其柔刚并施的政治手腕。3个月后，安东教育界开始稳定，凋零的市面也逐渐恢复，日寇屠杀爱国人士的恶果得到了掩盖。由此，谷次亨在植田谦吉司令官那里挂上了号，很快调回首都“新京”，在伪总务厅内当了第一任中国人次长。

谷次亨当了次长以后，志得意满，一心想知恩图报，于是以伪次长的身份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欺骗性的《鸦片断禁》政策。

用鸦片来毒化和压榨殖民地人民，乃是英帝国主义使用伎俩。日本也承袭了这一衣钵。在中国东北积极推行害民灭种的鸦片政策，被它们称之为“一石两鸟”政策，既可以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达到亡国灭种的目的，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据谷次亨自己交代，伪满初期，各种税收预算不过八千数百万万元，其中鸦片税收占一半，是伪满的主要财政收入。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搞鸦片专卖，特设“大满号”、“大东号”两大公司专事经营，在沈阳设有烟膏制造厂，明令热河为种烟区，这一切不仅引起中国人的愤慨，由此更激起国际舆论的谴责。正当关东军寻找掩人耳目的办法时，谷次亨等人积极向关东军顾问原一郎建议，倡导实行所谓“鸦片断禁”，表面上打出“禁烟”的旗号，实际上是搞官办，变性纵毒。这一狡猾的似禁实不禁的策略，正

中日本人下怀，当即被采纳。1938年2月，成立禁烟促进委员会，谷次亨任干事长，具体策划了所谓“十年断禁期限”，“调查瘾者，确定吸烟量”，“实施鸦片专卖”等自欺欺人的把戏，对鸦片中毒者根本没有任何禁毒措施，相反却规定不登记者不售与鸦片，结果引发伪满城乡各地普遍搞“鸦片瘾者登录”。这样一来，只要登记就能领到吸烟证，凭证买烟，使吸鸦片者更加“合法”化，百余万人沦为瘾者，对鸦片的需用量也越来越大，特在沈阳、锦州、海龙等地设了30余个鸦片推销机构，每年售出鸦片达1000余万两。又在长春、哈尔滨等地新设10余处毒品制造厂和作业所，大量生产烟膏和白面，致使每年因中毒而死亡者平均1.5万余人。谷次亨大搞断禁的结果是越禁越多。日伪当局便加劲扩大鸦片栽种面积，开始，栽种区域主要在热河，1938年栽种面积为54万余亩，年产量为800万两；后来不断扩大到奉天、四平、吉林三省。日伪当局通过这种专种、专制、专卖，大大增加了收入，1940年竟一跃为1.26亿元，是伪满财政收入的重要财源之一。谷次亨个人也从中大发横财，他掩饰不住得意的心情，到处吹嘘禁烟促进委员会的出差费多的不得了，每年不下数十万元。他就这样借助鸦片成了烟业暴发户，一时风传出去，他又开始担心个人人身安全，曾向当时新京伪警察总监于镜涛要过贴身保镖。

卢元善自知自己仕途经验不多，要想在伪满政坛立住脚跟，非发挥个人所长，来讨好日本人不可。他的所长：一是在日本学过农业技术；二是在关东州日本殖民地搞了近20年的奴化教育，因此他就注意在这两方面显露自己的本事，为攀登官阶自行搭好梯子。

他是通过学生韩云阶的引荐进入伪满政界的。他首先在农业经营与开拓移民方面取媚于日本人。“九·一八”事变前，满

铁在其附属地建立了几个农事试验场（即农业研究所），一是在南部的熊岳，一是在中部的公主岭，只差北部没有，伪满成立后，就决定在北部再搞一个，这就是克山农事试验场。1933年冬，时值卢元善在伪龙江省任实业厅长。负责操办此事，先是筹划收买土地，从当地农民手中购买，本来每垧值300元，他与伪实业厅事务官佐佐木龟太一唱一和，事先谋划好了，佐佐木开口将地价压到最低，每垧只给40元，50家地户叫苦连天，这时卢元善假充好人，每垧给加价20元，经过一番讨价，终于以60元钱一垧的地价，使日本人贱买了克山西门处最好的200垧地，为农事试验场的开设打下了基础。自此，卢元善在伪实业部挂上号，紧接着1934年春，伪中央实业部农矿司长松岛鉴打电报来，指名让卢元善去东京参加日本的农学大会。名义上是农学大会，实际上是打着农学研究的幌子，在日本国内大造开拓移民的舆论。为此，松岛鉴当面授意卢元善在大会上做特别演说。卢元善果然不负日本主子的要求，他根据松岛的意见结合自己的农学知识，在东京东学大会上大讲黑龙江土地如何肥沃，面积如何广大，人烟如何稀少，虽然春夏季短冬季长，但夏天日照时间较长，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生长，非常欢迎日本人渡海前来开垦。卢元善觉得光演说还不够，又在会下将民国年间所定的黑龙江省“抢垦章程”，向有关人士做了具体介绍。接着，他又去京都、九州两地做了同样的讲演。事过一年，伪满民政部设立了拓务司，并相继成立了日满拓殖会社、满鲜拓殖会社，颁布《满洲拓殖会社协定》，开始从日本大量移民，计划20年内移民100万户，500万人。

移民开拓，是“九·一八”事变前军国主义的“满蒙狂”煽动扩大和侵略的主要舆论。他们叫嚷说：“狭小的日本住腻了，都去满蒙开拓新天地”。伪满洲国一成立，加藤完治、东宫铁男

等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小量移民工作。1937年，日本政府决定向满洲大量移民。卢元善的特别讲演，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者蒙骗了日本国内许多不明真相的穷苦农民，起了舆论动员的作用，可谓帮了一个大忙。因此，在1939年，日本国政府拓务省召开日满开拓座谈会，又把当时任三江省省长的卢元善找去，在会上他又作了一个发言，这是按伪开拓总局长结城清太郎的要求讲的，说什么“满洲国很欢迎日本开拓移民，在我管辖的三江省就有1000万垧土地，其中有600万垧可耕地，我已经收买好了450万垧土地，一切都准备好了，希望你们赶快动员移民去，如果去晚了，那些土地可就要撂荒了”。会后，卢元善被请到加藤完治办的柞木县内原移民训练所参观，再一次代表“满洲国”人民对日本移民表示热烈地欢迎。回来以后，卢元善就积极投入移民工作，还去佳木斯参加东宫铁男纪念馆的修建仪式，尊这位军国主义分子为“开拓之父”。为接纳蜂涌而来的日本移民，卢元善带头将三江省3/4的土地让出来，供开拓民使用，因而名噪一时，被称为“开拓省省长”。日本的开拓移民做为一种侵略手段，带给东北人民无穷的灾难，不少农民被强征土地，闹得流离失所，无立锥之地。老百姓恨开拓局，称之为“开刀局”。卢元善就这样帮助“开刀局”任意宰割人民的土地和生命。

卢元善除懂农业外，还深谙奴化教育。1943年4月，日伪想进一步箝制人民思想，全面推行奴化教育时，武部六藏等人自然就物色到了他，让卢元善出任刚恢复的伪文教部大臣，又给他配上一个得力助手——田中义男。此人曾当过关东总局的教育部长，是搞奴化教育的老手，他此番从日本文部省来伪满任文教部次长，与卢元善结合，二人可算是“志同道合”的搭档了。伪文教部成立伊始，他们首先拼力抓神道宣传。为推行

“惟神之道”，他们又专门聘请日本神学界的权威小野正康在文教部教学司任职，专事指导所谓神化教育的事宜。他们确定当时的文教方针是“惟神之道”，学校里到处修小神庙供奉天照大神，每日朝会必唱伪满国歌“神光开宇宙，表里山河壮皇猷”；背诵《国民训》，让人们知道“建国渊源于惟神之道”；读《国民奠定诏书》，让人们认识“我国建立以逮至今，兹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平时更通过各种方式鼓吹“八纒一宇”，强迫学生拥护“大东亚圣战”，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甚至连电影、戏剧、歌曲、美术等也都渗透了神道说教。最后连道教、佛教等也都被划入神道的范围之内。总而言之，在卢元善的组织下，神道统治了当时伪满的思想文化领域。如有人对此表示反感，则被视为犯了大不敬罪。铁岭市长徐渐九，一次在开会时私下与学校校长、教员闲谈，打比方说供奉天照大神就是把老张家的祖先拿到老李家供了……结果被拘捕，判了7年徒刑。一时闹得人人噤若寒蝉。卢元善也到处鼓吹让人们认清“国是”，声言各国均有“国是”：苏联是赤化主义，中国是三民主义，“满洲国”是惟神之道，给人们套上思想的枷锁。他不仅讲演，还写歪诗颂扬日本在太平洋进行的侵略战争，吹捧说“皇军有事太平洋，东亚人民喜若狂，占领美英根据地，共荣圈里共荣昌”。

阎传绂除有旅大地区“二等皇民”身份外，还有东京帝大的同学为靠山。如曾任伪总务厅长的远藤柳作和神秘的关东军嘱托松木等人，在关东军面前曾帮他周旋。所以，当他在滨江省长任内因与白俄有较多联系被怀疑时，虽然一度受到关东军的冷落，但很快在帝大同学的帮助下，重新获得信任。并于1942年9月出任伪司法部大臣，取代老官僚张焕相，帮助日本殖民统治者操起司法统治的杀人屠刀，把伪满洲国变成一座阴森恐怖的大集中营。最严重的是经他手于1943年9月18日颁布了《保

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设立矫正辅导院，推行所谓“决战下行刑的思想矫正制度”。所谓“保安矫正”，是把认为有“犯罪”危险的人送进特设的“矫正辅导院”，进行无限期的拘禁，并让他们从事苛重的劳动，而所谓“思想矫正”，则是对可能犯有“政治罪”者，实行“预防拘禁”，也要服以繁重的劳动。可见，所谓“矫正”，一方面对人民实行严酷的法西斯高压统治；另一方面又可以借此役使劳力，从事侵略战争急需的军工生产，可谓一箭双雕。不仅如此，阎传绂还配合前野茂、中井久二、太田耐造等人搞了个法律上的新“创造”，与“预防拘留”，相对应，弄出了个“预防犯罪”，明确规定，凡是有犯罪之虞者，皆可抓来进行“矫正”。这样，不仅已服刑期满者被认为有“前科”，可以再抓来进行“矫正”，还有“嫌疑劳动者”——无业游民被视为“浮浪”，也要抓来“矫正”。总之，有了阎传绂颁布的这两个“矫正法”，日伪军警可以随便对某个人扣上“有犯罪可能”的帽子，随时随地抓走。对抓人的方法，规定有两种，一种是“个别索出”，就是个别逮捕；一种是“一齐索出”，就是集体逮捕。日伪司法当局大张警网，任抓无辜，或是在电影院将正在看电影的人，不容分说地将适于当劳工的男人扣上“浮浪”的帽子，成批地带走；或是在热闹的街市上，将马路两头堵住，对青壮年诬以“有犯罪之虞”，全行抓走。报载，1945年，一次在哈尔滨街面上就抓走1 000人，送往鞍山服劳役。据王贤伟说，他在伪奉天市长任上，为执行“两法”，于1943年搞大检举，一次就抓走5 000余人。总之，从1943年“两法”公布后，直至1945年伪满垮台近两年时间，被捕抓而关押的“犯人”有10 000余名。这些被抓的人，关在“矫正辅导院”里或留置场中，稍有不服从的表示，马上就给加上联锁、手铐，严重的穿上“镇静衣”，这是用皮子制的，穿在“罪犯”身上再发

水，皮子遇水抽缩，直缩得人的浑身上下如同上了夹板一样，最后窒息而死。平时衣食住条件极为恶劣，又没有防寒和医疗设备，加上过重的劳累，致使大批人员死亡。鹤岗“矫正辅导院”驱赶人们去煤矿干活，矿下没有什么保安设备，一次冒顶塌方，压死6个人，有的人被压成血肉饼，景状十分凄惨。冬天该院因死人太多拉不出去，就将死人堆成垛，然后集中往东山大沟里扔。不只是鹤岗，其它凡有“辅导院”、刑务署的地方就有扔死人的“万人坑”。连阎传绶自己也承认：“1945年6月，我去通化视察时，知道通化矫正辅导院监禁的500余人中，死了200余人。”

此外还有所谓“肃正工作”，伪司法部门在城镇搞“大检举”，制造出一系列震动全伪满的大逮捕事件，以及在三肇、巴彦、木兰、东兴、热河等地设立特别治安庭，成批地杀害抗日爱国军民；在三肇地区，于零下39度严寒中，将无辜的老百姓投入冰窟窿里；在热河，大抓捕之网竟遍及长城沿线，于1944年仅在兰旗营子一地一次即逮捕2000余人，被杀害者达120余人，真是血流成河。阎传绶作为伪司法部大臣是难逃罪责的。当然，不管日寇怎么信任他，让他充当战时紧急状态下的伪司法部大臣，但他始终是个傀儡角色，一切还要受前野茂、辻翔郎、中井久二等司法界的实权人物操纵，自然这些人罪孽更深重一些。但阎传绶毕竟还是在自己的双手上，留下了屠杀人民的斑斑血污。

王贤伟虽是学机械制造的工科学生出身，但在其父王永江熏陶下，很懂得一些为官之道，又加上有日本人做靠山，在伪中央的官场上干得又硬又冲，人称汉奸中的“少壮派”。

1938年，他被调到核心部门——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做参事官。人事部门是日本侵略者控制傀儡政权的枢纽，一般人

难以涉足其间。王贤伟做为被日本人一手培养提拔的“旅大派”走红人物自当例外，他在人事处帮助日本人出谋献策。果然，他去人事处一年间就参与制定体现伪满基本人事制度的《文官令》。该令重新调整和规定了官俸等级，分特任官、简任官（内分二等）、荐任官（内分三等）、还有委任官、职员、雇员等等，并进一步明确了升级程序、标准和经办手续，确定了定员、定位和考试制度。由于以日语做为考试的主要标准，故实行《文官令》的结果，使得旧有的中国人官吏逐渐被淘汰，一些会日语的，像王贤伟这样的二等皇民，纷纷被提上来。在伪官吏中，除升等考试必有日语外，还专门设了“语学考试”，此项考试合格者另外发给高额津贴，以资鼓励。王贤伟就这样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推行语言文字上的文化侵略。为了推行《文官令》，他还去电台做讲演，宣传《文官令》如何体现“满洲国”人事制度的科学与“公正”，考试制度如何合情合理。王贤伟更于1938年带队去日本组织进行高等文官采用考试，每次考试过后均采用百余名左右，其中日本人占70%，中国留学人员仅占30%。这样，王贤伟在积极推行《文官令》的过程中，又制造出一个恶果，增大了日本人官吏的比例，王贤伟自己也承认，当时在伪满政府的简任官和荐任官约有3万人，日本人官吏比例占2/3。

1940年秋天，北满抗日活动十分活跃，日伪警务统治十分紧张。日本侵略者为全面培养、锻炼王贤伟，特意把他调往哈尔滨任伪警察厅长。哈尔滨警察，在伪满是出了名的厉害，他们设了“松花塾”，专事抓捕拷打我爱国抗日人员，平时在市巷里凭着手中的警刀，到处扰害平民百姓，当时哈尔滨的警、宪、特孔关相勾结，为赚取活动费共同办了一个太平桥赌场。该赌场里面乌烟瘴气，动辄大打出手，成为哈尔滨公认的一害。王贤伟到任当厅长以后，想显示自己的“冲劲”，要动手解决太平桥

赌场。他也知道凭个人能量在当地整不动，特意跑到伪都新京找到警务司长谷口，反映了赌场的问题，经过一番周折，赌场终于取消了，但也惹恼了哈尔滨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的人。王贤伟情知他这个厅长是惹不起他们的，又赶紧与之拉关系，专门派出外号“叶扒皮”的伪司法科搜查股长叶永年，组织了有20余伪警的搜查班，和哈尔滨宪兵队一起活动，赶赴三肇地区参与搜捕镇压抗联十二支队的活动。叶永年的搜查班在三肇搞了一个多月，抓捕270余人，判刑处死者10余人，拷打致死者不计其数，他们残暴得将松花江凿开窟窿，把爱国志士、抗日群众塞进冰水中，活活冻死。1940年末，他又转任伪奉天市警察局长，带领部下大抓“经济犯”，据他自己承认，在1941年一年间，处理所谓违反经济统制案件有5000件，其中有1200件，涉及1300余人被起诉判刑。

由于王贤伟干得这么强横，很得关东军的欢心，随即被调回伪总务厅做次长。1945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濒临失败前夕，他还陪着张景惠去日本东京，送去30万吨大米和70万担食盐，进行“慰问”。汉奸们都说他是“后起之秀”，好一个“后起之秀”，在卖国求荣的邪路上真是“后来居上”呢！

（摘自《汉奸秘闻录》）

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

宋伟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了我
国东北，随即制造了其卵翼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伪满